

國家圖書館藏 滿文文獻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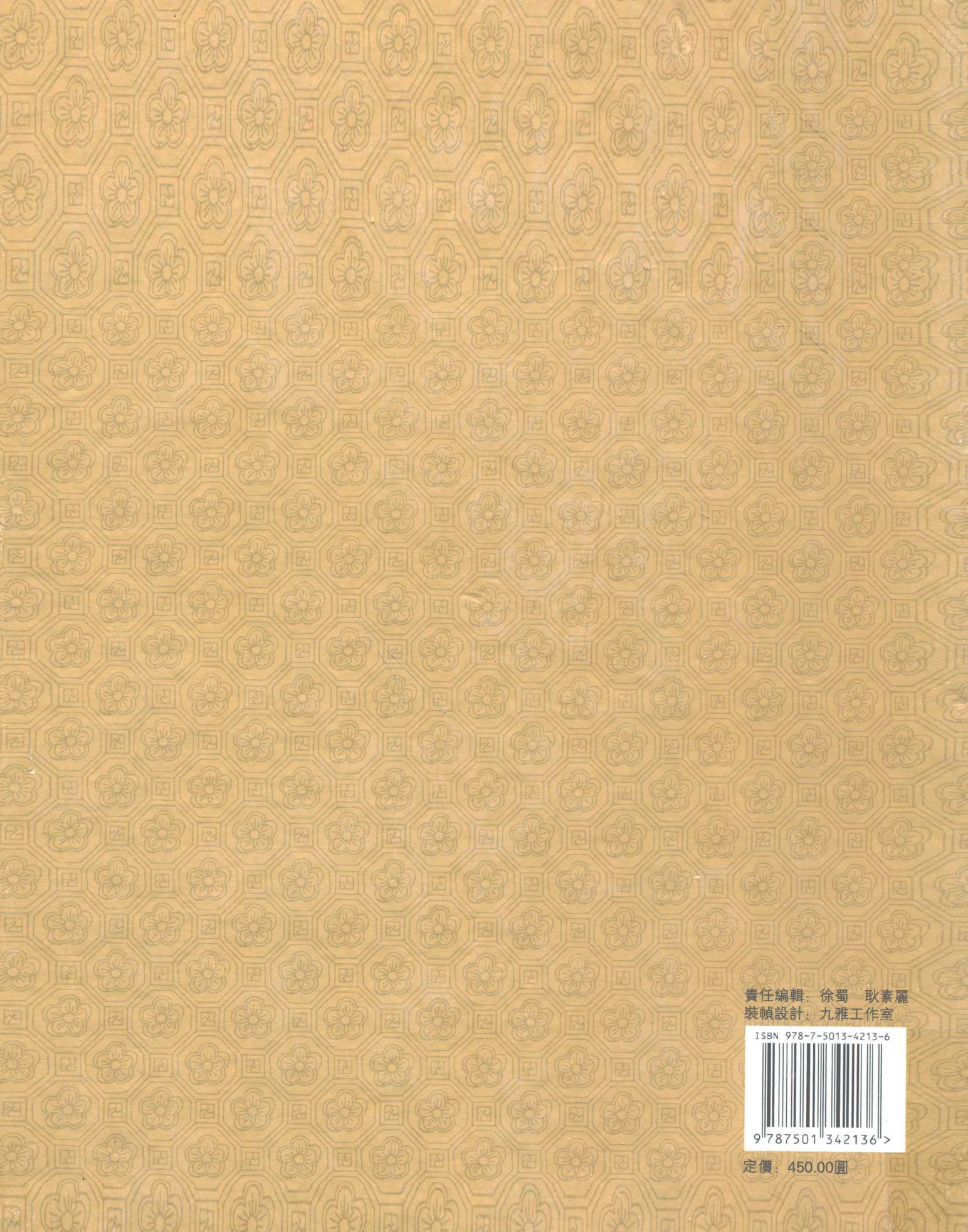
黃潤華 主編

梵域娑羅震旦交讓生同大椿其壽無
量毘舍浮佛七佛之三樹下得道心境
示衆 毘舍浮佛偈曰 亦曰初祖脩道樹下
直指心傳即六波若聖僧西來宣揚普
教恰值壽辰慧日普照寫此靈根用延
遐算七葉紛數千齡曩衍泥日法會茶
毗應身非一非二化被無垠
乾隆庚子仲冬月上澣御筆寫壽
班禪聖偈并讚

此乃乾隆皇帝御筆所書之壽偈，內容為讚頌班禪大師之功德。文字以滿文書寫，並附有漢文釋義。圖中可見多個紅色的方形印章，為皇家御用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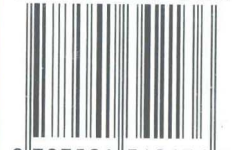
此部分展示了多條垂直排列的滿文文獻，內容為各種宗教或歷史記錄。每條文獻旁均附有紅色的方形印章，這些印章是辨識文獻真實性和來源的重要依據。





責任編輯：徐蜀 耿素麗
裝幀設計：九雅工作室

ISBN 978-7-5013-42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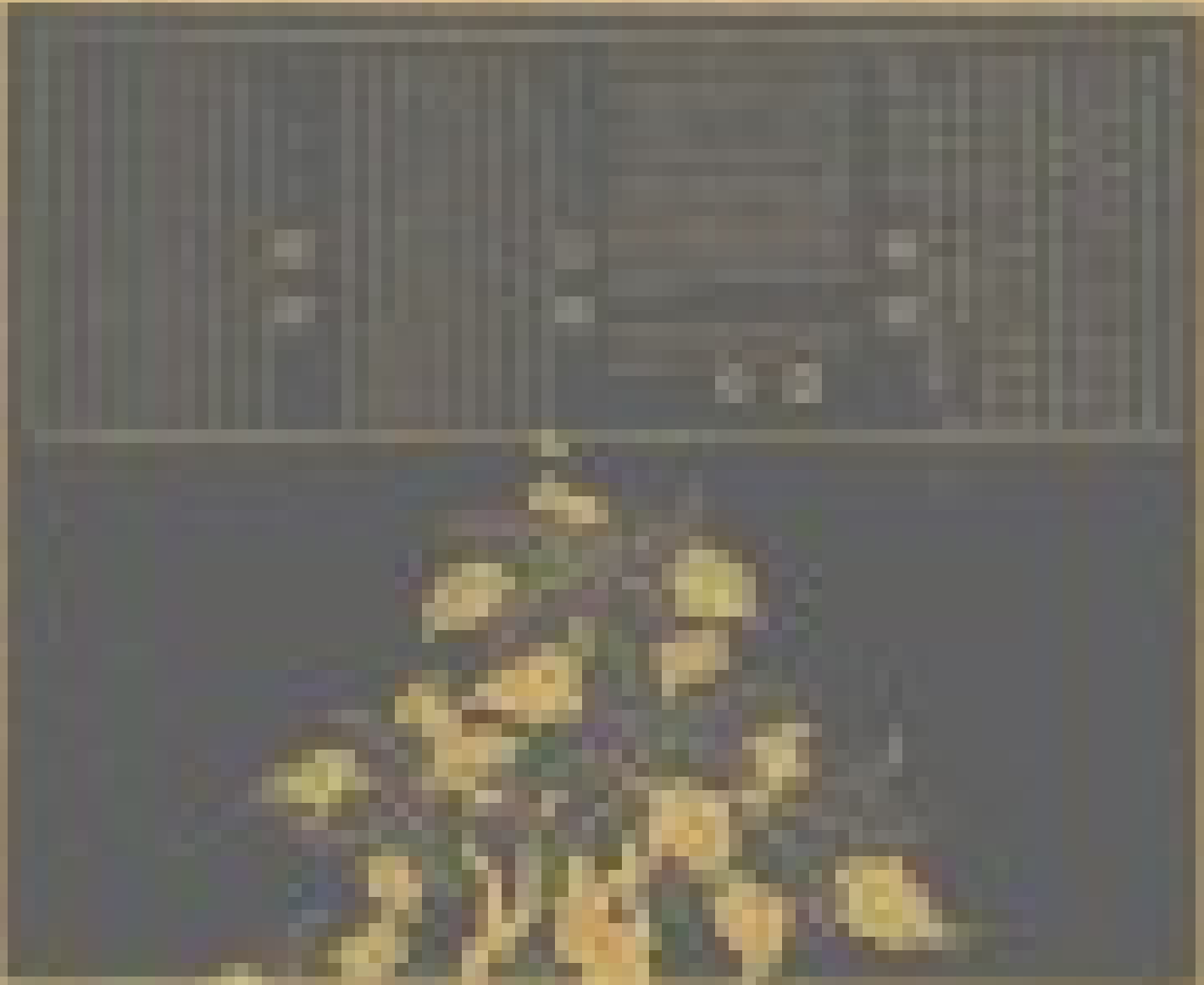


9 787501 342136 >

定價：450.00圓

國家圖書館藏 清文獻圖錄

1995年



國家圖書館藏 滿文文獻圖錄

黃潤華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家圖書館藏滿文文獻圖錄 / 黃潤華主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13-4213-6

I. 中… II. ①黃… III. 滿語—文獻—中國—清代~民國—圖錄 IV. G256-6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205198號

國家圖書館藏滿文文獻圖錄

黃潤華 主編

責任編輯 徐蜀 耿素麗

設計製作 九雅工作室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聯興盛業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張 26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213-6

印數 1-1000

定價 450.00圓

前 言

16世紀後半葉，滿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建立後金國，繼而入關，統一中國，建立了大清王朝。這是中國歷史上繼元代之後第二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政權，歷時267年，在歷史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滿族是我國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民族。說其古老，是因為她族源綿遠，說其年輕，是因為她以“滿洲”之名登上歷史舞臺至今僅有300多年時間。早在兩千多年前，滿族的先人，漢文史籍中稱之為肅慎或息慎者，便派使者到周朝進貢矢石。漢晉之間的挹婁，南北朝時的勿吉，隋唐時期的靺鞨都是一脈相傳。到10世紀，以女真之名顯赫於世，建立大金國，稱威中國北方百餘年，創造了自身歷史上的一個亮點。

金朝滅亡後，在東北地區尚有200萬女真人，有一部分融入漢、蒙古等民族，另有半數在元代仍保持女真習慣，到明代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①

建州女真原居黑龍江依蘭縣一帶，元末明初南遷至綏芬河流域，因綏芬河下游雙城子為渤海率賓府建州故地，因此得名。永樂元年（1403）明政府設建州衛，永樂十年（1412）設建州左衛，正統七年（1442）增設建州右衛，歷史上有名的“建州三衛”至此最後形成。

海西女真在明初是指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區的女真，因朝鮮人將依蘭以西的松花江稱為海西江，海西女真因此得名。至16世紀初形成哈達、烏拉、葉赫、輝發等海西四部。

野人女真又稱東海女真，是指建州、海西以外的女真人，主要居住在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以漁獵為主，社會發展落後，與明朝的關係不甚密切，朝貢不常。

明朝在東北地區設立衛所進行管理。衛所主要官員由明政府任命，並要定期向明朝納貢，平時負責守邊，聽從明政府的調遣，違反法律明政府要對其治罪，內部糾紛由明政府調解。

明朝所立的衛所中，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得一孫子，這便是以後成為清代開國皇帝的努爾哈赤。其祖父、父親在戰爭中被明軍誤殺，明萬曆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以為其祖、父報仇的名義起兵，從此開始了統一女真的大業。經過不斷征戰，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基本上統一了女真各部，於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西老城）建立

^① 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497頁。

“金國”（史稱後金），被奉為“承奉天命養育列國英明汗”，國號天命。

後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爾哈赤正式伐明，天命十年（1625）遷都瀋陽，翌年在攻打寧遠的戰鬥中，努爾哈赤傷重而亡。其子皇太極繼位，是為清太宗，改元天聰。天聰九年（1635）十月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定族名為滿洲，從此一個新興的朝氣蓬勃的民族正式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拉開了演出長達270多年的一部大戲的序幕。

努爾哈赤不僅是一個馬上取天下的開國皇帝，也是一個注意文治的君主。建州女真在擴張中，對內發布政令、記錄公務，對外文書往來日益增多，而正在崛起中的滿洲人苦於沒有自己的文字，只能依靠蒙語文來交際，這就造成很大的不便，不利於滿洲新興政權的發展。於是努爾哈赤在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下令滿洲文士額爾德尼、噶蓋創制自己的文字，這個決定順應了歷史的發展，對滿族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初創的滿文借用蒙文字母，沒有圈點，有許多局限性。使用30多年後加以改進，前者被稱為“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後者被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現在我們所說的滿文一般是指新滿文而言。

有清一代，用滿文纂修、翻譯了許多圖書、檔案，此外還有許多碑銘、印璽、錢幣等亦用滿文。清代尊滿語為“國語”，滿文又稱清文，與外國行文或簽約均使用滿文。道咸以後，滿文應用已不如前，但直至清末，滿文作為官方的正式文字仍在繼續使用，清朝滅亡後，纔逐漸廢棄。滿文在300多年的使用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文獻。從文獻的種類區分可以分為書籍、檔案、輿圖、碑銘等。綜觀中國歷史，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能保留下來這麼豐富的民族文字文獻，是絕無僅有的。

一、滿文圖籍

在現存的少數民族文字圖書中，除了藏文，滿文圖書的品種與數量是最多的。滿文書籍從版本上講可以分為刻本圖書和抄本圖書兩大類，刻本圖書又可分為官刻與坊刻兩種。

（一）滿文官刻本

1. 滿文官刻本的濫觴

公元1599年，巴克什額爾德尼和噶蓋奉命創制滿文後，用滿文記錄了大量上諭、公文、函件等檔案文獻，這就是後世稱之為《滿文老檔》、《國史院檔》等的歷史資料。

滿族在關外時期，用滿文翻譯了很多漢籍。從努爾哈赤崛起於建州之初，隨着與明王朝關係的發展，漢籍的滿譯便開始了。努爾哈赤時期，被稱為滿族聖人的達海便受命翻譯漢籍，太宗時期，翻譯規模擴大，成立了專門機構，滿文初名“筆帖赫包”，意為“書房”，後滿文改名“筆帖赫衙門”，到乾隆年間修訂《清太宗實錄》時，嫌“書房”過於俚俗，又更名為“文館”。太

宗時文館主要有兩個職能，一是記錄當朝政事，二是翻譯漢籍，譯書仍由達海負責，另配有四名筆帖式作為助手。達海年三十八卒，“時方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皆未竟”^①。

據史料所載，清朝在入關前所譯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通鑑》、《三韜》、《孟子》、《三國志》、《禮部會典》及一部分大乘佛教典籍等十餘部之多。這些書籍譯出後，以何種形式流傳，有無專門的刻書機構，因無史料記載，所以難有確說。昭槿在《嘯亭續錄》中提到皇太極將達海所譯《三國志》和四書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既是“頒賜耆舊”，恐難以逐部抄寫，由此可以推定，最有可能是刻板印刷。20世紀30年代初在內閣大庫發現的清入關前形成的滿文原檔中有一冊木刻印本，內容是敕書檔，這是滿文最早印刷品之一，現與滿文原檔一道保存在臺灣故宮博物院。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陳列室裏，有一件崇德四年（明崇禎十二年，1639）六月二十六日的告示，內容是後金國戶部諭官民人等禁煙（當時音譯為：丹白桂）的通告。其中對種植、運輸、吸食煙草作了種種嚴厲罰處的規定。這份告示為紙質，高約60厘米，寬約80厘米，為滿漢合璧，右為漢文，共11行，滿行28字，左為滿文，共12行，這麼大的一張佈告當時肯定是為了張貼而印的，而且是在一整塊木板上雕刻印刷的，字體碩大，印刷清晰，可讓離它三尺距離的人一目瞭然。這是現存的後金時代有具體年款最早的一件滿漢合璧印刷品，從這件木版雕印的告示來看，佈告上的滿漢文字跡端正，清晰流利，雕版和印刷的技術已十分嫻熟，可見當時的刻印技術水準已經很高了。這件文告除了歷史價值、法律價值外還有十分重要的文獻版本價值。可以說關外時期是滿文刻本的濫觴時期。

2. 滿文官刻本的發展

順治元年（1644）五月，清軍進入北京，從此建立了全國性的政權。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滿文刻書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順治年間滿文圖書已出現了少數坊刻本，如南京聽松樓刻印的《詩經》等，但是以內府刻本為主。

清代官修圖書承襲明制，仍由翰林院負責編撰。翰林院在順治初年併入內三院，後獨立。翰林院官員除大量的漢族文人外還集中了一批滿族官員和文人，參與滿文或漢文圖書的編撰。清初，為了適應漢籍滿譯工作的需要，專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②。直到咸豐年間仍有此機構。翻書房將漢籍譯為滿文後，即付刻印。順治年間，宮內刻書還是利用明朝的刻書機構經廠。從滿文文字看，順治年間刻本有着獨特的風格，字體剛勁古樸、字裏行間尚有老滿文殘存風韻，與康熙刻本的字體有較明顯的區別。

① 《清史稿》卷二二八。

② 昭槿：《嘯亭雜錄》之《嘯亭續錄卷一·翻書房》。

順治三年（1646）刊印了遼、金、元三史，此書在清太宗崇德四年（1639）已由希福等人奉旨譯成，順治三年祁充格等人刊刻成帙。據李德啟先生研究，此三書為漢文三史之本紀部分，這是清入關後首次刊印的滿文圖書。

順治三年還刊印了一部滿文圖書，即《洪武寶訓》（一名《洪武要訓》），這是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奉敕譯的。《洪武寶訓》是入關後翻譯的第一部漢籍。

順治七年（1650），又刊印了《三國志演義》滿譯本。《三國志演義》早在關外曾由達海譯過，入關後，遵攝政王多爾袞諭旨，由大學士祁充格等組織重譯。清朝入關前後，兩次翻譯《三國志演義》，並非因為其為文學名著，實以此書為兵略。

順治八年，皇帝親政。這個時期以皇帝的名義撰寫、編纂了一批宣揚儒家思想的書籍，並往往以滿漢兩種文本同時刊印，如《勸學文》（順治十年）、《御製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十二年）、《御纂內政輯要》、《太上感應篇》（順治十四年）等。順治三年（1646）刊印的《大清律集解附例》（滿漢文本）是清代第一部法律全書。順治一朝約刻18部滿文圖書。

3. 滿文官刻本的繁榮

公元1662年，玄燁以八歲沖齡繼承帝位，是為康熙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間，中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強大封建國家，社會經濟文化得到全面恢復和較大發展。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的繁榮又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康熙皇帝本人也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融滿漢兩種文化為一體，對西方科學技術也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他提倡經學、史學、文學，“留意典籍，編定群書”（《清聖祖實錄》語），除按例編修《實錄》、《聖訓》等書外，他還組織班子編纂經、史、文等方面的圖書，促進了皇家刻書業的發展，滿文官刻圖書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

康熙時代皇家刻書業發展的一個標誌是武英殿修書處的設立。武英殿修書處建於康熙十九年（1680），隸屬於內務府，專門編撰和刊印官修各種圖書。滿文的內府刻本也得以嶄新的面貌問世。這時期滿文的殿刻本變得更加規範，字體典雅，有些圖書用開化紙大字印刷，紙張潔白細膩，字體墨色勻潤，裝幀精美考究，有一種特殊的皇家宮廷氣派。

康熙一朝大約刊印了20多部滿文圖書，大致可分以下幾類：

（1）經書 有清一代，自太宗、世祖起，均尊孔崇儒，到康熙時，更是把崇儒尊道作為文化國策。康熙帝親政後，延請宿儒大臣進行經筵日講，從康熙十六年（1677）開始陸續刊印了《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等書，康熙帝親自為之撰寫序言。他本人提倡經學、理學，晚年命李光地編了《性理精義》十二卷，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譯成滿文刊印。這些圖書開本都較大，用紙都是白色開化紙，裝幀大氣考究。

（2）政書 清朝在建立了全國性的政權以後，各項行政法規制度逐漸建立健全，統治經驗

也日漸豐富。康熙帝認為“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法”，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令編撰《清會典》，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全書共162卷，所載內容自崇德元年（1636）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止。《清會典》是清朝行政法規的大綱，它的編纂反映了清政權的鞏固和成熟，為以後的修典奠定了基礎。

康熙時期修纂的重要滿文政書還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刑部新定現行例》（康熙十九年）、《太祖聖訓》（康熙二十五年）、《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八年）等。這些政書在當時有很強的實用性，並為康熙後各朝提供了典範。

（3）語言文字及文學類 這部分圖書數量不多，但所編印的幾部本身規模宏大，對後世的影響也很深遠。語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御製清文鑑》。此書前後經三十五年方告完成，這是一部百科全書性質的滿文分類辭典，上白天文，下至地理，包括軍事、禮樂、飲食、器物等共280類，12000餘條，附有總綱（即索引），為滿文譯學中第一部綱領性鉅著。這部辭書開了清代官修辭書的先河，乾隆時期編纂的各類清文鑑無不以此為楷模。

文學類圖書的代表作品是《御製古文淵鑑》。這是一部古代散文彙集，全書包括自春秋迄唐宋文章共693篇，分64卷，由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徐乾學等奉敕編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英殿刻本，有漢、滿兩種文本。漢文本用彩色套印，鮮明豔麗，體現了當時最高印刷水準。滿文本雖無彩色印刷，但印製也相當精美。開化紙棉白細軟，字體端莊，墨色鮮亮，裝幀考究，是康熙時代皇家滿文刻本的典範。就其內容而言，《古文淵鑑》是清代大規模翻譯漢族古代散文的第一部集子，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以後如道光年間譯的《古文觀止》，咸豐年間的《翻譯古文》都受到這部書的影響，但它們的內容和規模遠不及《古文淵鑑》。

康熙年間的滿文刻本中，有一些書其官刻特徵不很明顯，但根據種種跡象，可以判斷不是坊刻而是官刻，甚至是內府刻本。如“七本頭”，這是包括《黃石公素書》、《菜根譚》、《孝經》、《御製三角形論》、《性理一則》、《醒世要言》、《潘氏總論》等七種圖書的一函叢書。這部書開本較小，用紙普通，也沒有用“御製”作為總書名，但從內容看，《黃石公素書》是達海在關外所譯，經和素校後刊印的，《御製三角形論》則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數學論文。

另外一種書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印的滿文《金瓶梅》。此書向被列為“誨淫”之作，順治、康熙兩朝屢有上諭明令嚴禁“淫詞小說”，在這種氛圍下，《金瓶梅》居然能譯成滿文並刻板印行，在文網盤結的當時，如果不得到特別允准是不可能的。關於這部小說的滿譯者眾說紛紜，有和素說、徐元夢說、康熙之弟說等幾種。不論是何人，肯定都是達官貴族。由此可以推斷，《金瓶梅》滿譯本最有可能是官刻本。

雍正年間，滿文官刻圖書繼續發展，但這個時期，滿文官刻本的種類與數量都顯得較為單調、稀少。從種類上看，主要是兩大類，一類是政書，如《大清律集解附例》、《吏部銓選官員則例》、《吏部處分則例》（以上均為雍正三年刻本）、《大清會典》（雍正十年刻本）等。另

一類是雍正帝的言論文章，如《聖諭廣訓》（雍正二年）、《雍正上諭》（雍正二年、十年）、《朋黨論》（雍正二年）、《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覆》等。

4. 滿文官刻本的鼎盛

進入乾隆時代後，滿文官刻圖書迎來了自己的鼎盛期。乾隆六十年中，內府所刻滿文圖書，無論從內容、數量和書品上看，都超過了前三朝，其後歷朝亦未有出其右者。據初步統計，乾隆一朝滿文官刻圖書約有20種左右。從內容上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1）重新整理翻譯儒家經典。《詩經》在順治年間已經翻譯，康熙時期，四書、《易經》、《書經》、《孝經》等一批儒家經典都譯成了滿文，或以“日講解義”的形式刊佈。乾隆帝即位後，認為有的譯本如《詩經》因翻譯過早，一些詞語為《清文鑑》未收，不很規範；有的譯本如《易經》，一些卦名象象的翻譯“對音乏舊，未盡翻意”，為了“嘉惠來學”，“不留餘憾”，下令對一批儒家經典重新翻譯。於是，四書（乾隆六年）、《詩經》（乾隆三十三年）、《禮記》（乾隆四十八年）、《春秋》（乾隆四十九年）等一批儒家經典譯作相繼問世。

（2）繼續編纂刻印太宗、世祖、聖祖和世宗等歷代皇帝的《聖訓》。除世宗的《聖訓》為乾隆五年編纂外，其餘幾位皇帝的《聖訓》早已編就，於乾隆年間陸續刊印。

（3）加強政書的修纂。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清律例》的修訂。《大清律》最初制定於順治三年（1646），當時清王朝剛定鼎北京，諸事待舉，急需一部法律，但時間所限，只能“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來應急。康熙兩朝，屢加修訂，經過近百年的總結、完善，到乾隆五年（1740）命大臣對清律詳悉參訂，重加編輯，並以滿漢兩種文本刊佈。其後又陸續刊佈了《大清律續纂條例》、《大清律續纂條例總類》。

《大清會典》是乾隆時期修訂的另一部規模宏大的政書。《清會典》最初成書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年間又用了十年時間進行修纂，乾隆帝即位後，針對康熙兩朝所修會典中的一些舛訛疏漏，於乾隆十二年（1747）下令重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滿文本刊佈。

乾隆一朝為了強化中央集權統治，加強了建制立法，對各項規章制度廣為編纂，不斷修訂。除上述兩部大型律典外，一批則例也相繼問世。有的還不斷修訂，如《八旗則例》初刻於乾隆七年，後於二十九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五十年分別續修。這些則例不斷修訂，反映了乾隆時期的法規制度不斷補充完善，是清中央集權制度逐漸強化成熟的標誌。

（4）重視史書的編修。乾隆帝在即位前就熟讀史書，深知“以史為鑒”的重要性，所以對史書的編修十分重視。從康熙年間開始，每次用兵之後，都要成立專門機構，將有關軍事行動的諭旨奏報編纂成集，是謂“方略”。乾隆一朝，用兵較大規模者有十次之多，乾隆帝因之自號“十全老人”，他仿照康熙纂修方略、紀略，譯成滿文的有《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三十五年）、《平定金川方略》（乾隆四十五年）等。此外還用滿文刻印了《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乾

隆二十九年)、《大破明師於薩爾滸》、《開國方略》(乾隆五十一年)、《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乾隆六十年)等歷史圖書。乾隆九年(1744)刊印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詳細記載了新老滿洲族源世系和歷史,是研究滿族歷史的權威文獻。

(5) 關心滿文工具書的編纂。乾隆帝為了加強滿族的統治基礎,針對當時八旗官員及其子弟久處太平,驕逸自安,漢化程度日益加深,對滿洲舊俗逐漸淡忘的現實,特別提出了“騎射我朝根本”、“清語尤為本務”,規定將清語騎射作為滿洲舉人會試、官員陞黜和宗室王公承襲爵位的條件。乾隆帝親自指導編纂了一系列滿文、滿文與其他語文相對照的工具書,同時對滿文進行整理規範,為滿文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編成的《御製增訂清文鑑》,這是在康熙朝編的《御製清文鑑》的基礎上進行改編增訂的,比《清文鑑》增加新詞4700餘條,比原書增加了約二分之一,並將全部辭條譯成漢文。後來在《增訂清文鑑》的基礎上,又發展到《四體清文鑒》和《五體清文鑒》(後者僅有抄本)。又如《西域同文志》(乾隆十五年完成),把中國西北地方的地名和一部分人名用漢、滿、蒙、藏、托忒蒙文、維等六種文字對照彙編,是研究清代西北地方地理歷史和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

(6) 滿文大藏經的翻譯。有清一代,把崇奉喇嘛教列為國策,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蒙藏地區,保障中央政府的有效統治。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諭開始翻譯滿文大藏經,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告成,歷時十八年。

乾隆時期還翻譯刻印了其他一些佛教經典,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印的《大藏全咒》及《皈依經》、《普賢行願品經》等。乾隆帝本人也親自譯過一些佛經,如《吉祥偈》、《金剛經》等。可以說,滿文佛經的刻本絕大多數都是乾隆朝翻譯刊印的,這些佛經或是作為供奉,或是供皇家寺廟中喇嘛唸誦,散入民間的很少。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滿文佛經大多是民國年間從清東西陵皇室家廟中收集來的。

滿文官刻圖書在乾隆朝達到頂峰並非偶然,而是有其內在的原因。一是經過上百年的發展,清王朝的統治日益鞏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繁榮都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形成了所謂“盛世”景象,為文化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其二是在乾隆時期,封建中央集權機構有了進一步發展,統治階級取得了豐富的經驗,許多法律、政令的制訂、修改反映了皇權的加強。當時在清政府統治機構中,滿洲官員仍占主要地位,滿語文還有一定的使用面,各類滿文圖書特別是實用性很強的政書有較大的需求量。再者是乾隆帝本人的作用。這位皇帝本身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特別對漢文化的瞭解與吸收都達到了相當深的程度,而他本人又有着十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他“稽古右文”、提倡清語騎射的政策指導下,滿文圖書的撰修、翻譯、刻印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

5. 滿文官刻本的式微

清代自嘉道以降,國力衰微,內憂外患日益嚴重。滿文官刻圖書也逐漸式微,最後變成一

種官方的點綴。嘉道咸三朝的六十多年中，除了依照慣例編纂刊印上一代皇帝的“聖訓”外，只刻印了《理藩院則例》（嘉慶二十二年修，道光二十九年重訂）、《回疆則例》（道光二十二年印本）等滿文政書，續纂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分別刻於嘉慶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咸豐九年），此外並無新書問世。到同光時期，官方所修滿文圖書，大多只以稿本、抄本留了下來。

滿文官刻圖書發展到頂峰後迅速跌入低谷，進入式微階段，究其原因，除了乾隆朝以後，政治腐敗，內亂不止，帝國主義的入侵使中國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等歷史因素外，與當時滿語文使用面急劇縮小也有直接的關係。

有清一代，滿文官刻圖書可以說是由皇家統攬刊印的，只是到清代中葉以後，在一些地方長官衙署纔有刊印之舉。如嘉慶二十三年，西安將軍署刻印了《清文指要》，廣州將軍衙門和成都駐防八旗官學、荊州駐防翻譯總學在光緒年間也刻印了《滿漢文八種》、《清文總彙》、《清語輯要》等書，這些地方官署和學校刊印的都是學習滿文的教科書和工具書，以滿足當地呈小聚居狀態的八旗子弟學習滿語文的需要。

從清同治年間開始，各地有官書局之設，刻印大批圖書，是清末地方官刻的重要代表。滿文書在官書局刻書中極為鮮見，現所知僅有《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是光緒四年（1878）江蘇書局刻本。

（二）滿文坊刻本

民間刻本主要是指書坊和刻字鋪印的書籍，另有一些私人的家刻本也屬此列。清代的書坊雖遍及全國，並形成了北京、蘇州、廣州、佛山等幾個刊印中心，但就滿文圖書而言，其刊印中心僅在北京一處。

北京作為金、元、明、清四朝的首都，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明代北京的刻書業就很興盛。但是現在有明確年款的最早的滿文坊刻本卻不是北京刻的，而是南京（金陵）聽松樓刊印的《詩經》，成書於順治十一年（1654），共6卷6冊，滿漢合璧，版框高22.8厘米，寬14.6厘米，每半葉上面是滿文，9行，版框高13厘米，下面是漢文，也是9行，版框高9.8厘米。扉頁有牌記“新刻滿漢字詩經”，滿漢文分別左右，中間印“聽松樓藏板”，首頁為滿文御製序。中縫漢字題“滿漢詩經”。像這樣滿漢文分別上下刻印的圖書僅見於清初，以後多為間行刻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種刻本，滿漢合璧，全書兩冊，內容都是格言。每半葉兩行，左為滿文，右為漢文。第一冊每行三字，第二冊為四字。三字的如：“仁為宅，義為路，忠為首，孝為先，儉為常，智為根”等，四字的如“動不可躁，靜不可怠，非不可飾，過不可文，群不可黨，量不可狹”等。根據刻書的風格判斷是順治年間的坊刻本。

順治年間的坊刻本僅此二見，而刻滿文書的店鋪僅知南京聽松樓一家。

康熙年間，刊印滿文書的書坊多了起來，除南京的聽松樓仍在刻印外，北京先後出現了10

家刊印滿文書的書坊，它們是宛羽齋、秘書閣、玉樹堂、尚德堂、寄暢齋、天繪閣、文盛堂、四合堂、三義堂、尊古堂等。宛羽齋在前門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印了《大清全書》。天繪閣、尊古堂都在西河沿，清初這一帶是書籍的刊印中心。南京的聽松樓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印了《清書全集》，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了《同文廣彙全書》，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了《滿漢類書全集》，另有滿文本《孫吳子兵法》，未有明確年款。其餘幾家書坊各只有一種刊印。

到雍正年間，北京刊印滿文圖書知名的書坊達13家，它們是鳴皋閣、敬修堂、宏文閣、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鴻遠堂、墨華堂、精一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華堂、二槐堂等。其中老二酉堂是個老字號，在琉璃廠，這家書鋪在雍正十一年（1733）刻了《滿漢全字十二頭》一書，這是一部學習滿文的基礎書，到乾隆年間老二酉堂還刻過滿文書，後未見再有滿文書問世。三槐堂是出版滿文書較多的一家書坊，從雍正到光緒，綿延近200年，以三槐堂的名義刊印圖書持續不絕。

乾隆時期，前後有十多家書坊刻過滿文圖書，留有堂號的除前面提到的之外還有文瑞堂、永魁堂、秋芳堂、清宜齋等，主要集中在乾隆四十年前。乾隆四十年後只有雙峰閣、三槐堂、文盛堂等幾家。

嘉慶年間滿文坊刻本很少，有堂名的僅見嘉慶二十一年（1816）文盛堂重刻的《六部成語》。文盛堂也是一家老字號，早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就刻印過滿漢合璧的《西廂記》，乾隆六十年（1795）又刻過《六部成語》。

道光年間刻印滿文書的店鋪依然不多，留有堂名的有炳蔚堂朱氏書坊、五雲堂、三槐堂和聚珍堂等。前面說過，三槐堂的堂號最早出現在雍正年間，雍正二年（1724）刊印過滿漢合璧《聖諭廣訓》，雍正八年（1730）刻滿漢合璧《清文啟蒙》，後又刻《讀史論略》。乾隆年間又刻有四書（乾隆二十年，1755）、《清漢對音字式》（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字經注解》（乾隆六十年，1795）。

道光年間的三槐堂在隆福寺對門，其於道光十年（1830）刻的《圓音正考》一書，首有滿洲烏扎拉氏文通序稱“庚寅春，三槐堂書坊龔氏宜古，持《圓音正考》一冊，欲付梓，請序於余，兼請校正其訛”云云。可見道光初年，三槐堂主人為龔姓。在此之前，道光二年（1822）三槐堂已刻過《吏治輯要》，三年又予重刻。咸豐、光緒年間，三槐堂不斷有滿文書問世，是滿文刻書時間較長、數量較多的書坊。

另一家刊印滿文書較多的書肆是聚珍堂。聚珍堂亦在隆福寺，據記載其前身為天繪閣，則其歷史可追溯到康熙年間。以聚珍堂名義刊印的滿文書最早可見的是乾隆年間的滿漢合璧四書，道光二十年（1840）刻滿漢合璧《音韻逢源》。這類歷史悠久的老字號儘管招牌不變，但主人屢易。光緒二年（1876）聚珍堂主人為劉英烈，原名王盛，字魁式，河北束鹿人。這家書鋪一直經營了

五十多年。聚珍堂在光緒年間滿文圖書刻印活動是比較活躍的一家。

光緒年間，滿文書刊印事業似乎出現了“迴光返照”，除三槐堂、聚珍堂兩家老字號外，還有柳蔭山房、尚友堂書坊、文淵堂、文寶堂、名德堂、護國寺蕭氏等數家。這期間，石印技術傳入我國，光緒三十三年（1907）北京石印館刻了滿漢蒙三體合璧《分類漢語入門》。這一時期在外地，如湖北荊州積古齋、盛京西彩盛刻書鋪也都有滿文書刊印。外地滿文書坊刻本僅見於順治年間的南京聽松樓和清末的荊州、盛京，中間幾百年竟一無所見。

有確切紀年的最晚的滿文書是宣統二年（1910）由湖北荆防廣化善堂刻印的《朱文公家訓》。作為滿文圖書刻印中心的北京，到清末，印刷技術已改進為石印，最後的滿文圖書是宣統元年石印本《滿蒙漢合璧教科書》。從內容上看，已出現了“強國之道，以兵為本”、“陸有炮臺，海有戰艦”這些具有“新學”的內容了。這昭示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同時也標誌着刊印滿文圖書的時代即將結束了。

1. 滿文坊刻本的內容

坊刻圖書與官刻圖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它具有明顯的實用性，因為它是將書籍作為商品，以追求利潤為根本目的而刊行的。圍繞這樣一個基本特點，坊刻滿文圖書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普及讀物

清代把崇儒重道作為國策，把儒家倫理思想作為維繫自身統治、鞏固封建政權的基本道德規範，因此從順治帝開始，就十分重視這方面的教化。

清初順治帝發佈“六諭”，康熙帝推衍為“聖諭十六條”，到雍正帝登基，標榜自己“以聖祖之心為心，以聖祖之政為政”，將“十六條”逐條解釋，引申發揮，輯成《聖諭廣訓》，於雍正二年（1724）內府刊印，並敕令將此書刊印至直省州縣，各地學官每月朔望向士庶宣講，使之家喻戶曉。到道光三十年（1850），清宣宗又對《聖諭廣訓》作了一番解釋，並敕令作為書院家塾的必讀書。既然統治者如此看重，所以《聖諭廣訓》自雍正年開始直至光緒朝，不斷有坊刻本刊行，成為版本繁多、印量頗大的暢銷書。

大約在嘉慶年間，出現了一部《吏治輯要》，由鐵嶺高鶚編著。道光二年（1822）由北京的三槐堂出版發行，當年便銷售一空，翌年又重刻，咸豐七年（1857），此書被譯成蒙文，到光緒年間，三槐堂、聚珍堂又同時刊印，可見此書在清末廣受歡迎的程度。

（2）四書五經

清襲明制，以科舉取士，漢族士子按省舉行考試。為了使八旗子弟同樣得到功名，同時設八旗官學，從順治八年（1651）開始，舉行鄉試、會試。在官學學習和考試的內容均是儒家經典，因此四書五經的翻譯與出版就成為很大的社會需求。現存最早的坊刻本便是順治十一年（1654）聽松樓刻印的《詩經》。四書是儒家的基本經典，因此很早便譯成了滿文，由坊間刊行。現在能

看到最早的坊刻本是康熙三十年（1691）玉樹堂的滿漢合璧四書刊本。乾隆帝登基後，對四書譯本重新作了一次釐定，從乾隆二十年後直到光緒年間坊間大量刊印，像三槐堂、二酉堂、聚珍堂、保翠齋、寶名堂、名貴堂、文光堂、聖經博古堂等都有印本，可以說四書滿漢合璧本在清代是最暢銷的坊刻書之一。《易》、《書》、《詩》、《禮》、《春秋》等五經的印量也較大。

（3）啟蒙讀物

《三字經》、《千字文》是漢族通行啟蒙讀物，流傳長遠。滿族入關後也接受了這些讀物，雍正二年（1724）惟德、陶格將《三字經》譯成滿文，後經乾隆到道光，近百年中一再刊印，道光十二年（1832）還譯成蒙文。《千字文》也有三槐堂、文萃堂、敬修堂等書坊先後刊印過。

（4）文學作品

屬於文學作品的坊刻本品種不多，但從譯文和書品來看都屬上乘之作。如《西廂記》有兩個譯本，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寄暢齋刻印的《精譯六才子詞》，由劉順譯校。此書只譯了《西廂記》中的曲文部分，每葉漢文列上，滿文列下。兩年後出現了一個全譯本，由文盛堂刊印，滿漢合璧，可惜未著譯者姓名。

《翻譯詞聯詩賦》是文英堂刊印的，四卷，滿漢合璧，刊印時間不詳，從風格上看較晚。首卷為詞，卷二為楹聯，卷三是詩，卷四為賦，此書流傳不多。

小說有《聊齋志異》，這部短篇小說集成書於康熙年間，經過一百多年的流傳，到道光年間由盛京工部主事扎克丹選書中129篇故事，譯成滿文，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印行後頗受歡迎，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由北京二酉齋再次印刷，所用書板即是道光年間初刻的原板。

《三國演義》是清代翻譯最早的一部小說，《三國演義》滿文本問世後，又出現了一種滿漢合璧本，共48冊，滿文與順治譯本同，漢文列在滿文之右。從漢文中“玄”、“貞”均已避諱，而“弘”字未避這一情況推斷，此種滿漢合璧本應是雍正年間所刻，從其刻工、紙張及裝幀等情況看，應是民間坊刻本，但是未有刊印書肆的牌記和其他著錄內容。

（5）滿語文專業類圖書

清代把提倡清語騎射作為國策，乾隆皇帝認為“騎射我朝根本”、“清語尤為本務”，把能否堅持清語騎射，能否保持滿洲舊俗看成是有關清政權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順治朝開始即開設八旗官學，鼓勵八旗子弟學習滿文，並開設翻譯科，使八旗子弟學習滿文後能得到好的出身，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清代對滿語文的學習、研究和傳播始終未有間斷。從官方來看，康熙朝編了《御製清文鑑》、《滿蒙文鑑》，乾隆朝更有《御製增訂清文鑑》、《三合切音清文鑑》、《四體清文鑑》、《五體清文鑑》（未刊本）等鉅著推出，民間也出現了相當一批滿語文的研究著作和工具書。

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京都宛羽齋刊印了《大清全書》，這是有明確年款的最早的一部滿語文專門研究著作，它包括了滿語的語音、語法和滿漢對照辭書。滿語學家李德啟先生稱此書保

留了清初一些滿語詞，為後來辭書中所無，對研究滿語發展歷史具有獨特的價值。^①此書出版30年後，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北京三義堂重新刊印。

雍正二年（1724）李延基編著了《清文彙書》。這是一部滿漢語文詞典，比《御製清文鑑》還多收了2000多個詞，是清代版本最多、流行最廣的辭書之一，這部書的影響也很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有《清文補彙》問世，由宗室宜興編著，共八卷，體例與《清文彙書》同，又補充詞條7300餘條。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志寬、志培將兩種詞書合併，名《清文總彙》。

雍正八年（1730）舞格編著了一部滿文教科書，名《清文啟蒙》，四卷，以漢文解釋滿文語法，從語音十二字頭開始到滿語套詞、虛字等，內容全面，在清代流行較廣。乾隆年間有關學習滿語文的專業圖書刊印更多，較有影響的有《清文典要》（乾隆三年，1738）、《六部成語》（乾隆七年，1742）、《翻譯類編》（乾隆十四年，1749）、《音漢清文鑑》（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話問答四十條》（乾隆二十三年，1758）等。清代後期出現的《清文虛字指南編》（光緒十一年，1885）、《初學必讀》（光緒十六年，1890）等反映了晚清時期滿語研究的新水準。

2. 滿文坊刻本的特點

綜觀有清一代滿文坊刻本圖書，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

（1）書肆自己刻板自己發行。這種情況比較普遍。書肆往往在牌記上只注明堂號，或寫明某家藏板，有的還注明書肆地址。如《御製翻譯書經》就寫明“京都琉璃廠瑞錦堂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有的書則蓋章說明，如乾隆二年刻的《滿漢經文成語》扉頁鈐有一章，上印文字“京都徐鋪住順城門外琉璃廠英華堂藏板”。

（2）多家書肆同板刊印。有的書雖然同時有幾家書肆刊印，但仔細一看，可以發現用的是同一板，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一些滿語文專業圖書上，如宏文閣與文瑞堂在雍正十三年（1735）同時推出《音漢清文鑑》，這是一部滿漢對照的辭書。又如《翻譯類編》，這是一部滿漢分類詞典，共收約3000個詞，在乾隆十四年（1745）由文淵堂、鴻遠堂、永魁齋同時刊印，其中鴻遠堂與永魁齋用的是同一刻板，這種現象反映了在當時的刻書業中已有一定規模的聯手經營，儘管在市場佔有額上受一定影響，但這樣做的結果可以降低成本，出版的又是發行量較大的暢銷書，總體還是合算的。

（3）在一些圖書的牌記上標明“翻印必究”，如雍正十三年（1735）的《音漢清文鑑》、乾隆十一年（1746）的《一學三貫清文鑑》等。這種情況明代已有。到清代，書肆的版權意識更加強化，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特別在牌記上標明對盜版有追究的權利。

（4）有清一代刊印滿文圖書的書肆雖比較多，但就單個書肆而言，除少數幾個如三槐堂、

^① 李德啟：《國立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滿文書籍聯合目錄》，1933年，第22頁。